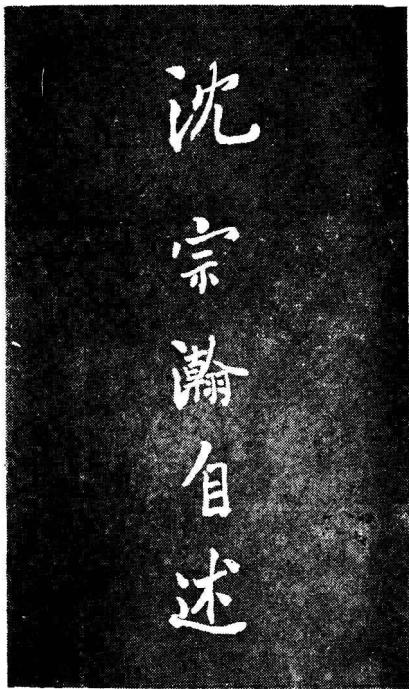


傳記文學叢刊

流言
亦猶有
不平事

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



五十三之刊叢學文記傳

傳記文學叢刊之三五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沈宗瀚自述

全一冊

精裝定價新臺幣四百元

著作者：沈宗

瀚

版所合發者：正中書局
有權訂行本：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一三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 0003691-0 號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



影 近 者 作

沈序

傳記，包括自傳在內，是一種兼具文學性與歷史性的作品，而却比純歷史或純文學都難寫。純文學是作者的自由創造，他可以虛構某些類型的人物，多種奇特的景色，和各樣極複雜的故事，而從心所欲地加以組織，只要言之成理，便可成佳構。傳記中的人與事都是真實的，不能隨意使其戲劇化，要寫得信雅動人，自是大難。純歷史是紀事的，只要作者能精於考證史料，便不難立論公允。傳記以人爲主，而知人貴在知心。故論事必須先明其意，觀過必須能知其仁。但歷來紀事之文有徵可信者尙多，而論人之言則表裡如一者甚少。諛墓之碑誌，文過之日記，黨同伐異之書札，出奴入主之論辯，諸如此類之所謂直接材料，俱須參衆說而一一加以核證，方能知其情偽，定其真假。爲人作傳之第一步工作——鑒定材料——就這樣的難，則動筆以後的情形可想而知了。作自傳或自述，自然沒有這種困擾，但却另有它的難處。（一）自己所極其珍惜的資料是否能爲後人所同樣重視，其爲本人所捨去不錄的又焉知不正是後人所急欲尋求的史料呢？這是取材之難。（二）描寫窮困奮鬥的經過易於感人，敍述成功的情形則很難着筆。因爲敷陳詳盡，則近乎自誇，過於含蓄則又嫌脫略。這是敍事之難。（三）

作者的私生活當然不願暴露，且認為這些都與世無關，實無公開之必要。因此老人歡聚常有「此樂莫教兒輩覺」的安排。那曉得這類行樂圖不獨可表現出人們真性情，而且正好展示出當時習俗風尚，確是傳記中的上好資料咧！這是作自傳時最難突破的一關。

如上所說，傳記，包括自傳，的寫作很難，但用處却極廣。司馬子長的不朽之作大部分用列傳構成，而更以自序——即後世之所謂自傳——終結全書。從此，官書私書莫不有傳，然皆不如太史公所作之生動。宋明以後，獨立成書之傳與自序平生之傳更是汗牛充棟，然而佳作甚少。更有人認為平凡的人值不得一寫，有資格被人為之作傳的不是盡善盡美的聖賢豪傑；便是全無人性的大姦巨慝。於是把傳中人都刻畫成一些略具形態毫無血肉的天神或妖魔。其作自傳者則總要向立德立言兩方面牽強附會，若曾入仕途，更必有功可紀；陳腔濫調，不獨失去了歷史價值，且毫無文學意味了。

近百年來，正當我國史傳之學極為衰敝之時，西方史學却有長足的進展，傳記作品亦隨之突飛猛進，遠過我國。因此有識之士，如丁在君、胡適之諸先生乃多方介紹歐美諸傳記名著，而鼓吹國人致力於新式傳記的寫作。一時聞風興起而從事於此類工作者頗不乏人。沈宗瀚先生所著之「克難苦學記」即為此時佳作之一。此後沈先生又陸續寫了中年及晚年兩種自述，均成為暢銷一時之書。

沈先生今年滿八十歲，特應朋輩之請，將三書編印為一巨冊，名之曰「沈宗瀚自述」，以為退休之紀念。這三書中第一部是作者攻讀農學的追述，第二部是他教授並研究農學的經過，第三部是他計劃並執行新農業政策的情形。這種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老而推廣之的工作原是一貫的，時間也是連

接的，故三書合一，毫無雜湊之嫌。況且沈先生之爲人，畢生未曾改變過志趣，赤子之心，老而彌真，樂天之情，久而愈篤。所以他寫最後一篇文章所用的筆調同他寫最早一篇一樣的靈活、流利，絲毫沒有老年人氣索筆澀的毛病，使人讀起來儼然是一氣呵成的。因此我們無論是就它的內容說，抑是從它的筆調上看，都應視之爲一整體的巨著。

在這本書裡，沈先生自述了他將近八十年的經歷。這八十年正是我國發生劇變的時期，政治由專制變爲共和；社會由相當關閉的農業社會變爲絕對開放的工業社會；民族由安土重遷的生活發生大規模轉徙以至散播到全世界；教育由遍地文盲變得普及全民；國際地位由次殖民地變成四強之一；文化經過空前未有的浩劫而露出即將普照大地的曙光。凡此種種，有的是作者親眼看到的，有的是他親身感受到的，有的是他親自參加過的，他寫的自然是萬分真切。這自然只是大時代中的一部份，但是若能舉一反三，是不難由管中所見之一斑而推想出一個全豹的，所以我們不妨把這本自述當作我國近八十年來現代化的簡史看。

我國從三代起便以農田水利奠定國本締造文化，歷數千年以至今日仍是以農業培育工業而復用工業推進農業。農經政策的周詳切實，與農業技術的日新又新，使我們在這山多田少，土瘠人多的島上，不特食糧有餘，而且能以農耕技術協助許多開發中的國家，使我飢渴爲懷的民族仁澤廣被西亞、南美以及非洲。這偉大成就有好些是作者策劃推行的。我們從他那些謹慎平實的敘述中可以曉得一個大概。對於近五十年來我國農業進步與農村改變的情形，也可以得到一種有系統的概念。

天下本來就沒有經常僥倖的人，也極少徒勞無功的事。尤其是近五十年來社會不變，已無「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能奮發精進，總可有所成就，出人頭地。此書中的主人翁就是這樣的一個好例子。他自幼至老，不斷地和險惡的環境奮鬥，和落後的習俗奮鬥，和爲害國家的惡勢力奮鬥，和首鼠兩端的外國政客奮鬥。始終不心灰、不氣餒、不自滿、不懈怠、不躁進、不因循，總是脚踏實地，循序漸進，日積月累地使其理想實現，事業成功。這是青年人最好的榜樣，他們應視此書爲勵志之作。

沈先生爲學治事的精神與態度總是很莊敬謹嚴，但他在圖書室和辦公廳外，却極爲和易近人。他家庭中充滿了倡隨的樂趣，孝慈的氣氛，恰合乎儒家的理想生活。其處世接物，則和光同塵而常自處於才與不才之間，又極富有老莊的修養。總之，他平生率性而行，均合情理，因而在「自述」中敢於自信事無不可對人言而把它一一寫出。諸如他「自公退食」後之間情逸致，與朋輩遊讌時之清談雅謔，以及他教子之有方，擇婿之審慎，大而能不爲高官所動心，小則可爲練拳而下苦功；這種種流露出真性情的言行舉止，都能寫得「婉而成章」，「盡而不汙」，令人讀之，大有重溫「世說新語」的韻味。這是師論語鄉黨篇的用意。真可謂取法乎上了！

宗瀚先生與予曾結車笠之交，時敦翰墨之誼，在此書付印前，先以稿相眎而囑爲之序。予義不能辭，因直寫評介之語於其卷首。讀者得無譏我爲佛頭著糞耶！

自序

本書是「克難苦學記」、「中年自述」及「晚年自述」三書的合訂，名爲「沈宗翰自述」。從此書可以看出八十年來的時代大變遷，由前清而民國而抗戰而遷來臺灣，使我不得不「與世推移」而數度調整我的思想學業與工作。

余生於前清光緒廿一年乙未（西曆一八九五年），家貧，耕讀爲生。幼時，父親與伯父先後教我四書五經與作文，如在科舉時代，由此就可應試求取功名。但那時科舉廢學校興，十五歲進誠意高小學校讀書，父親不能供給學膳費，幸我考試尚好，得列爲優秀清寒學生，免繳學膳費。

在高小讀書時，除功課外，我喜歡王陽明、黃梨洲、曾國藩等文章，啓發我知行合一與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十七歲起記日記，自省每日思想言行。又讀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及上海神州日報，激起我愛國熱忱。次年（辛亥）武昌起義，杭州光復，我離校試投杭州學生軍，因體格不合而失望回校。

民國元年冬高小畢業，次年（民國二年）一月浙江省立農業中等學校在杭州招生，規定每班前二名學生可免學膳雜費，我窮，想得免費，且從幼幫助農事很有興趣，遂投考入學，開始學農。

民國三年十二月我離浙江農校，去北京農業專門學校，籌借旅費與學膳宿費極苦，幸以後考試列第二名，免繳學費過了難關。

幼年聽大哥講基督教義，北平讀書時，向徐寶謙先生領教甚多。民國八年在北平教書，領洗入教。從此我日常禱告讀經，在思想與精神上受益無窮。當時北平為新文化運動中心，有若干馬克思主義者宣傳唯物史觀與無神論，我篤信教義，未嘗動搖。

民國九年四月我辭北平教書月收八十銀元的好事，而去湖南常德種棉，月僅二十元。當時北平生活安適，湖南軍事混亂，由於宗教的熱忱與實地改良棉花的志趣，冒險前往，是我服務農業的開始。

自民國七年北農畢業後，我考試留美未取，至十二年以自己儲蓄及借款籌足一年費用，去美讀書，次年起獲得獎學金，完成我的博士學位。

民國十六年自美歸國，任教金陵大學，教書研究極感興趣，教書可以訓練人才改進農業，研究可以改良品種，增加產量。以後我兼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小麥改良工作，設計推行全國小麥產銷改進計劃，頗為順利。惜好景不常，二十六年抗戰西遷，任中農所副所長，放棄教書研究，轉任行政設計協調工作，致力後方糧食增產。這是我農業工作的轉捩點。三十七年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委員，研究設計與協調臺灣農業發展並促進國際農業技術合作。近十年來，余研究倡導臺灣小農經營之企業化與機械化，以提高其生產效率與收益，並配合工商業之發展。

我的著作是根據我的思想研究與工作經驗而寫。在金大時以小麥遺傳育種為主，在中農所時以全

國糧食增產與自給爲主，在農復會時以臺灣農業發展爲主；自民國九年至六十四年，計中英文著作二百九十五篇，中文農書三冊，英文農書三冊，中文自述三冊，主編中英文農書各一冊。從我的寫作可以略知我國近代農業的發展。

我自赴美就學起，深感科學進步，各人研究分門別類，愈來愈細，其研究結果亦愈深愈狹，必須各方配合集思廣益，始能集大成，而使農民得到科學的實惠。故在金陵大學時，我得植物病理組協助，育成抗病豐產的「金大二九〇五」小麥；在中央農業實驗所時，設計推行全國小麥改良之協調合作計劃，以增加工作效率；在抗日戰爭時力謀中央與各省協調，分層負責，以增加糧食生產；來臺後，設計推行農業四年計劃，促進中央與地方上下貫通左右聯繫。近十年來臺灣工商業發展甚速，農工業收入差異甚大，我更信農工並重，相輔相成，始能達到社會經濟之健全發展。

我任教金陵大學十一年，任職中農所十七年，農復會二十五年。中農所與農復會是我參加創設的。我不願多換工作，因信工作熟能生巧，久而見效，尤以農業爲然，同事亦是愈久相知愈深，而合作愈易。國外機構曾邀我任職，在臺亦曾兩次得到調任其他要職的機會，我均婉謝未就。但爲創造新事業，則不畏難，不灰心。民國五十三年我參加籌設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與美國、日本、泰國、菲律賓、韓國、越南等政府洽商，經八年之久，至六十年始得在臺灣成立，我被選爲理事會主席，現已成爲國際第一流學術機構，以改進世界人類營養，增加農民收益，並打擊中共孤立臺灣之毒計。

民國以來，戰亂時多，安定時少，歷經艱苦，成敗互見，深信努力耕耘必有收穫，縱有時因颱風

豪雨、霜災蟲害，而告歉收，然已盡其在我，於心安矣。

最後我特別感謝沈剛伯先生患眼疾寫字不便時賜寫序言、姚朋與劉紹唐二先生賜跋的盛情。封面題字，紹唐兄堅囑我自寫，以資紀念。我雖不擅於書法，也只好遵照他的意思，不計拙劣了。

沈宗瀚 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廿九日台北

蔣序

一百年前，鴉片戰爭的結果，割讓了香港，又開了五口通商。本書作者的家鄉餘姚就是鄰近五口之一的寧波。又從寧波乘輪船到上海——五口中最重要的——只有一夜的航程。因為鄰近兩個海口，經過了短短幾十年時間，西洋的物質文明漸漸流入長夜漫漫的鄉村。洋油燈代替了菜油燈，火柴代替了火石與鎌刀。還有最重要的是英國曼却斯特的棉織品，消滅了家庭紡織工業。使男耕而女不織，家庭的經濟收入，自然減少。又於太平天國戰爭後，浙江享受了六十多年的太平。人口迅速地增加，過剩的人口雖不斷地流入上海，而耕地仍不足以容納。女子既無布可織，男子又乏可耕之地。在經濟與人口雙重壓迫下，有志的青年便不得不另求成功立業的出路了。

彼時科舉已停，耕讀已不能並行。耕則不能讀，讀則便不能耕。因為本來只要一部四書五經，就可作爲讀書上進的本錢。幾百年來一向如此。等到科舉停，學校興，一個學生出外求學，要備書費、旅費、學費、膳費等，處處要用錢。這錢是農家最缺乏的東西，從那裏來呢？

俗語說「一錢逼死英雄漢」。本書作者雖有堅忍之志，但想穿過這圓錢的方眼，真如耶教聖經所說像駱駝想穿過針眼一樣的難。

家庭窮，慈愛的父親舉債爲助。親友窮，節用爲助。但枯井汲水，來源有限，精神上的維持尤爲重要。克難之成功，精神實重於物質。此後如何抖擻精神，一步一步的打破難關，以至成功，讓作者

自己來說與讀者們聽罷。

在過渡時代做一個青年，想成功立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好多人在中流覆了舟，隨浪漂去。現在讓我們把作者——沈宗瀚先生——克難求學成功後最重要的貢獻附帶介紹幾句。

他在農業方面的著作和貢獻很多。照我看來，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一件是他在金陵大學任教時，學不厭，誨人不倦，養成不少優良的農業人才。一件是在中央農業實驗所任所長時立定了農業科學化及農業推廣制度的基礎。雖經過了十二位性格不同主管農業的部長，他的工作沒有間斷。抗戰時中農所工作站分佈了各省，繼續不斷地推行事業。至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成立時，他的同學和同事們擔任了該會有關農業部份的工作，都能勝任愉快。除農復會委員外，他現在兼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第四組召集人，對於農業四年建設計劃多所貢獻。

從這本書裡，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從求學時代起一直到今天，他的克難苦學的精神是始終一貫的。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八月 蔣夢麟

「克難苦學記」序

胡適

沈宗瀚先生的「克難苦學記」是近二十年來出版的許多自傳之中最有趣味，最能說老實話，最可以鼓勵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傳。我在海外收到他寄贈的一冊，當日下午我一口氣讀完了，就寫信去恭賀他這本自傳的成功。果然這書的第一版很快的賣完了，現在就要修改再版，沈先生要我寫一篇短序，我當然不敢推辭。

這本自傳的最大長處是肯說老實話。說老實話是不容易的事，敘述自己的家庭，父母，兄弟，親戚，說老實話是不容易的事。

一千八百多年前，大思想家王充（他是漢朝會稽郡上虞縣人，是沈先生的同鄉）在他的「自紀篇」裡，曾這樣的敍述他的祖父與父親兩代：

祖父汎，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業。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祖世任氣，至豪誦滋甚。故豪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未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

這是說老實話。當時人已嘲笑他「宗祖無淑懿之基，……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六百年後，劉知幾在史通的序傳篇裏，更責怪他不應該「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間所鄙」，「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一千六百年後，惠棟，錢大昕，王鳴盛諸公也都爲了這一段話大責備王充。王充說的話，在現在看來

，並沒有「厚辱其先」，不過老老實實的說他的祖父，伯父，父親都有點豪俠的氣性，所以結怨於錢唐的「豪家」。然而這幾句老實話就使王充挨了一千八百年的罵！

沈先生寫他的家庭是一個農村紳士的大家庭。他的村子是一個聚族而居的沈灣村，全村二百戶，七百人，都是沈族。村人貧富頗平均，最富的人家也不過有田二百多畝，最貧的也有七八畝。農家每日三餐飯，全村沒有乞丐，百年來沒有人打官司。這是一個典型的江南農村社會。沈先生自己的家庭就是這個農村社會裏一個中上人家。他的祖父水香先生，伯父少香先生，父親濂初先生都是讀書人，都是秀才，又都能替人家排難解紛，所以他家是一個鄉村紳士人家。

沈先生的祖父母有四男四女，他的伯父有五男二女，他的父親有六個兒子。沈先生剛兩歲（一八九六）時，這個大家庭已有二十多口人了。于是有第一次的「分家」。分家之後，「祖田除抵償公家債款之外，尙留田十三畝，立爲祖父祭產」。濂初先生自己出門到人家去教書，每年束修只有制錢四十千文。家中有祖田十二畝，雇一個長工及牧童耕種，每隔一年可以收祖宗祭田約二十畝的租錢。每年的收入共計不過一百五十銀元。不久這個小家庭已有四個男孩子了。長工是要吃飯的。這就是七口之家。沈先生的母親一個人要料理家務，要應付七口的飯食，要管辦父子五人的衣服鞋襪。所以他家每日三餐之中要搭一餐泡飯，晚上點菜油燈，只用一根燈芯，並用打火石取火。

這是這個家庭的經濟狀態。

沈先生十五歲時（一九〇八），他考進餘姚縣第四門鎮私立誠意高等小學堂，因爲家貧，取得「

寒額」的待遇，可免學宿膳費。他在這學堂住了四年，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冬季畢業。這四年之中，他父親供給了他七十二元的學校費用（包括書籍雜費）。他說，「此爲吾父給余一生之全部求學費用也。」

他十八歲才畢業高等小學。那時候，他家中的經濟狀況更困難了，他父親不但無力供給他升學，並且還逼迫他畢業後就去做小學教員，要他分擔養家的責任。這個「繼續求學」與「就業養家」的衝突問題，是沈先生青年時代的最大困難，也是他的「克難苦學記」的中心問題。他父親說的最明白：

「如吾有田，可賣田爲汝升學。如吾未負債足以自給，吾亦可借債送汝升學。乃今債務末了，利息加重，必須每年付清利息。如無汝之收入，吾明年利息亦不能支給，奈何？」（廿四頁）

但他老人家究竟是愛兒子的明白人，他後來想明白了，不但不反對兒子借錢升學，還買了一隻黃皮箱送給他！于是他籌借了四十多塊銀元，到杭州寬橋甲種農業學校去開始他的農學教育了。

沈先生在這自傳裏寫他父親濂初先生屢次反對他升學，屢次逼他分擔家用，屢次很嚴厲的責怪他，到頭來還是很仁慈的諒解他，寬恕他。最尖銳的一次衝突是民國三年他老人家堅決的不許他兒子拋棄寬橋甲種農校而北去進北京農業專門學校。老人家掉下眼淚來，對兒子說：

「……我將爲經濟逼死。你即能畢業北京農業專門，你心安乎？」這一次他老人家很生氣，逼着兒子寫悔過書給寬橋陳校長，逼着他回寬橋去。兒子沒法子，只能用騙計離開父親，先去尋着他那在餘姚錢莊做事的二哥，求他借四十銀元做北行的旅費，又向他轉借得一件皮袍，就跟他的同學偷跑到